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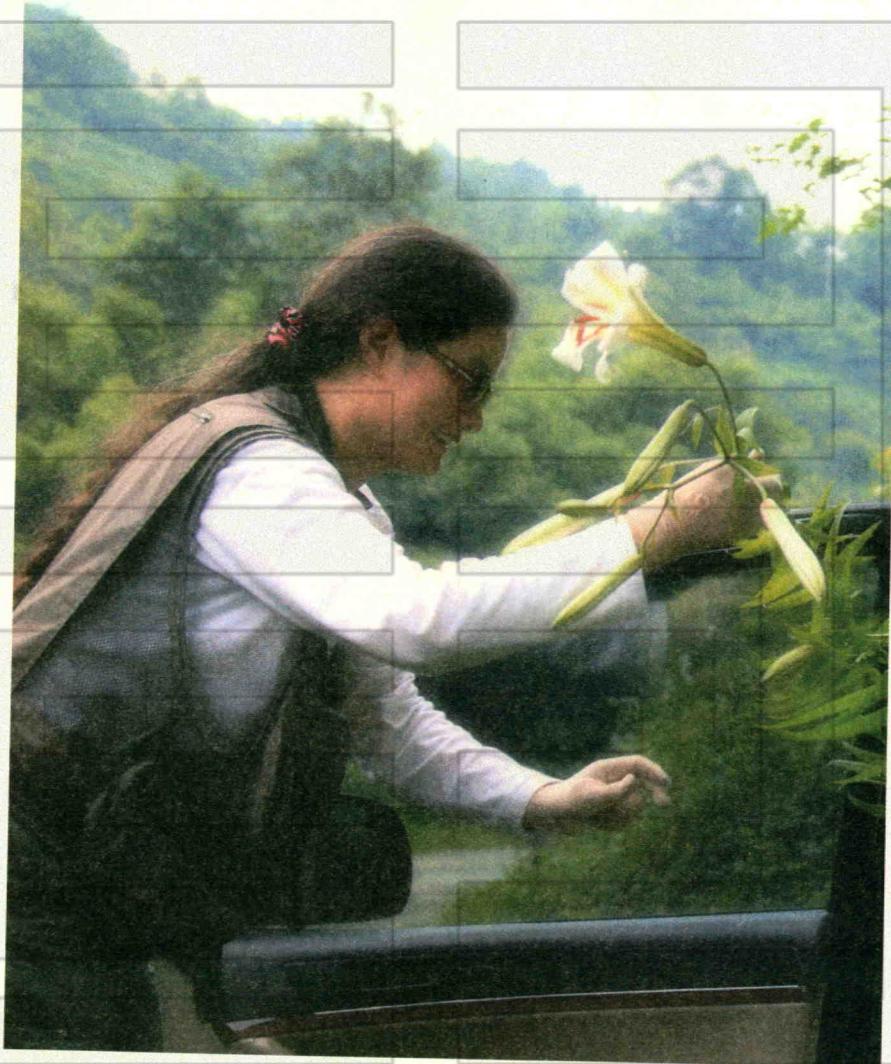
南疆

我相信存在真实，并仿佛筑起自己的
壁垒。但我似乎受到了释迦牟尼的濡染，那
条独行的路线也正为我所实践。倘若说这
也是一种修行。

尚昌平 / 著



◎南疆◎



尚昌平，文化行者、作家、诗人、摄影家。

南疆
古田
才

尚昌平 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XTO-1055380

CHISO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慕士塔格文丛 南疆 尚昌平◎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疆 / 尚昌平著. — 乌鲁木齐 :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11.6

(慕士塔格文丛)

ISBN 978-7-5371-9819-6

I. ①南… II. ①尚… III. ①南疆 - 概況 IV.

①K9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4727 号

出版人 徐江

责任编辑 骆娟

装帧设计 吾荣娜

图片摄影 尚昌平

出 版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社 址 乌鲁木齐市北京北路 29 号

邮 政 编 码 830012

电 话 0991-7833922(编辑部)

网 址 <http://www.qingshao.net>

发 行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营销中心

电 话 0991-7833932 7833911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法律顾问 钟麟 13201203567

印 刷 乌鲁木齐大金马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制 作 一心设计工作室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4.5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1-9819-6

定 价 39.80 元

CHISO!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问题可随时同印厂退换。

出版

絮

语

众所周知，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曾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如今已成为第二座“亚欧大陆桥”的桥头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新疆同各国的合作、交流日趋密切，有关新疆旅游、自然风光、风土人情、西域文化及科学研究、民族医药等体现地方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出版物，以其鲜明的主旋律、浓郁的新疆特色、丰厚的文化内涵，展示新疆独特的地域风情和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并产生了一定影响。

新疆本身就是一个出版资源的宝库，新疆的旅游资源、文化资源、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民风民俗，都为新疆出版提供了非常丰富的选题资源。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图书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特征更加明显的情况下，新疆本土资源图书也面临着更加优质和更大程度地满足个性化的需求，需要更多高品位、高质量、多姿多彩的优秀图书产品。在此情况下，我们希望能够巧妙地挖掘新疆文化的深度，将各种资源进行融合和浓缩，从而推出在深厚的文化内涵下，理性思考与感性叙述交融的介绍新疆的图书。

目前，在世界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各个国家发展格

局趋向于同质化，仍然保留着多样性民族文化形态的新疆已经是世界人民向往的人文胜地。为此，我们将策划出版的这套人文地理图书定名为《慕士塔格文丛》。被誉为“冰山之父”的慕士塔格峰，雄踞于帕米尔高原的东端，蕴藏着丰厚的人文内涵，是新疆最为神奇和壮阔的一道景观。以“慕士塔格”为丛书名，就是希望立足于“揭秘新疆地域，呈现多元文化，展示丰厚人文”的图书理念，将新疆丰富多彩的人文地理内容推介给更多的人。

《慕士塔格文丛》的作者目前在国内外都较有影响，先后出版过大量以新疆题材为主的著作。本套丛书收入的作品，都是作者潜心数年时间，深入新疆各地走访，参考了大量文史资料写成，力求对新疆地域和人文进行较为全面、准确、通俗的介绍。我们真诚希望，通过《慕士塔格文丛》的介绍，引领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

编者

二〇一一年六月

目录 [contents]

出版絮语	001
我心彷佛	001
佛行之路	005
克孜尔千佛洞	012
阿艾石窟悬想	018
昭怙厘寺	022
托普鲁克墩佛寺	026
玄奘	039
昆仑	049
亚门	057
流水村	060
驮工	068
狼道	074
喀什老城	078
石头城裸记	081
高山塔吉克	086
阿曼尼莎汗王后	091
库尔班·吐尔地·艾捷克	096
沙得尔·沙依提与木沙·尼牙孜	100
吐地·苏皮	105
吾斯曼·艾山	109
孪生兄弟	114

目 录 [contents]

渔猎刀郎	118
克里雅	122
沙尘暴	126
二十八棵胡杨	129
巴拉曼	133
达里雅博依	138
帕塔木汗	143
婚礼	146
赤狐:沙漠中的幽灵	150
记录烽燧	154
水塑风雕的绝地景观	160
失落的驿站	166
寻访楼兰故闾	170
孤独之河	178
楼兰古城,留下你的真名	187
罗布泊,一个终结神秘的湖	194
驿途的村庄	206
重返底坎尔	212
难忘胡杨	216

◎我心仿佛

行于路，止于心，但我很早就察觉到有条路铺设在搏动的心田，路就像架在心田上的浮桥，摇来晃去，即使在睡梦中，那架浮桥一刻也没能静止。

看遍龟兹洞窟，竟然意马心猿，忽然想起要在一座空洞里做自我解脱的修行，还原尘埃中行走的自我，而不是滞留在色彩斑斓的壁画中。壁画里的世界在我眼中渐渐变淡，于是，我走进山谷间荒废已久的洞窟。

崖壁上悬空三窟，依山傍水，是早期信奉小乘教孤僧的禅窟，洞窟都是苦行僧自筑而成。

古代龟兹早期的石窟寺一般开凿在崖壁同一水平线上，凿窟者在崖壁旁平缓的崖坡开出一条甬道，选择适当位置凿挖不同用途的洞窟，当洞窟修造好后，甬道就成为僧人来往于洞窟间的路径。这三座石窟采用的是另一种方法，借助一根砍出脚蹬的胡杨木，依壁凌空在崖壁上凿出容身之地，深凿出并排三座洞窟，洞窟下留有凿窟时堆积的土坡，供笃修者上下。



纵券顶的石窟空空如也，洞壁上的泥坯全部剥落，也许，当初这座洞窟也没有色彩缤纷的壁画。

洞窟一角张开一张蛛网，一只蜘蛛正在结网，那张网织得很密。网格上的蜘蛛行走自如，但那的确是一张美丽的陷阱，就像我眼前时时晃动的幻境，无形而具有诱惑力。

库车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很特别，有山而不高，有河并不多，屹秃的山峦看似荒凉，但峰回路转之间总会有林木扶疏的环境，这对修行的小乘教僧众而言，既能苦其心性，又无饮水之忧，栖隐山林也就不足为怪。

现今已发现的石窟六百余座，但这并不是全部，因为石窟分布极广，可以说是无山不窟。我时常见到山崖上凋敝的洞窟，这些洞窟有时被我临时用做歇脚之处，也许就是这个缘故，我对小乘教派的僧众情有独钟。

佛教盛行于龟兹是有历史渊源的，昔日的龟兹国不仅处在东、西方往来的交通路口，也是一个人文思想会聚交流的地方。公元2世纪，小乘教派“说一切有部”经律传入龟兹，最初的小乘教僧众，可能是一些来自犍陀罗地区的大月氏人。那条佛传之路要翻越崎岖绵延的兴都库什山，穿行荒凉的戈壁沙漠，但对那些传经布道的僧众来说并不陌生，因为他们的先祖是世居祁连山一带的大月氏，他们在走着一条回归之路。磨难的经历赋予了小乘教派僧众坚忍的秉性，至今遗留在龟兹境内的佛教洞窟，记录了佛教东渐的历史。

小乘教避世修行，目的是修成罗汉正果。如果说逃避今生是一种无奈，小乘教是以牺牲今生换取来生，熬炼肉体换取不再坠入深渊，并以无数个轮回拯救自身，最终达到理想境界中的永恒，那个目的实在是遥遥无期。

当小乘教僧众还在山中时，大乘教僧人已受宠于龟兹王宫，最初大乘教的戒律并不十分严苛。与小乘教修行宗旨不同，大乘教相信缘法，一朝顿悟，即可成佛。大乘教僧人顺则居于都市，起佛刹园林于闹市；逆则息隐林泉，清享佛教徒的供奉，这一修行宗旨和行为方式使大乘教存而不亡。

就二者的修行方式而言，前者是避世独修，后者则聚集于佛堂，不仅选修佛法的方式不同，修行的动机和目的也大相径庭。

当时，也有随大乘教游方不归的僧人，受大乘教派的影响，他们已不是昔日耐受清苦的佛门弟子，小乘教衰落的趋势已不可避免。

因此，当我看到崖壁上空旷已久的洞窟时，既为小乘教僧众心如磐石的

苦修而动容，也为他们最终陆续走出洞窟而生悲怨，或许，仅仅因为那种独自修行的方式暗合我心。

据佛本生记载，释迦牟尼是在遇到一个流浪人而萌生出家意念的，凡人出走未必弃俗，但追求精神上的自由是其必然，弃家出走是他宫闱奢华生活的了断，也是他顿悟的因，一切造化也都因释迦牟尼游走而缘生。

六年苦行的生活，让释迦牟尼心力交瘁，以至于在尼连禅河浣洗蓬头垢面时，竟不得不攀援树枝勉强上岸，当他饮尽了村妇施舍的牛奶时，顿有所悟，放弃了苦行生涯。采取苦行以达到解脱是佛教最初的修行方式，但后来的佛教徒大多数摒弃了苦行修道的方法，原始的佛教在教义上似乎并无分歧，只是因为不同的修行方式产生了诸多部派。

于是，成千上万的人在尼连禅河中趟过，或欣喜，或悲痛，或寂然，或雀跃，那条自然之河在众生推波助澜下变成了圣水，正不知圆了多少人的夙愿。

那条虔诚的人流朝东方走来，我翻检释迦牟尼身后的经卷，在经卷上圈点佛教东传途经的每一个驿站。那条似乎平静伸向邈远的路其实与我走的一样，我与斯途有一步之隔的选择，但不知为何潜意识走的却是平行的另一条路。我正坐在瀚海的古今路上，看着这条佛行之路。僧人走路是修禅，行者走路，只是不带禅风，我以为。

在我眼前，空灵的风在吹，一片片的经书在飞，《大般若经》《维摩诘经》《具舍论》在空中飞扬远去，流离的一切宗派人物从眼前走过，然而，洞中的我只看到流光在眼前飘浮，却走不进我的心田，那本不是我用心游历的世界。僧人那种信仰狂热我能理解，我的情感并非全然理性化，游走便是一种狂率，也因非理性至少不会亦步亦趋，跟随旁人吸纳尘埃。

一千八百年后，有我这样一个游走的人穿梭于佛窟之间，倘若说我和佛有缘，相似处在辞家而出，我的痴走可能缘于一个行者佛的缘分。

我以为，佛的境界不过是平常人生活升华的复原，达悟深处并不需要寻找那个永恒，而是平常态地在心里留下真实，佛的乐园毕竟在身外，我心里认同的乐园是将身边事物的感受化成欣悦。我不以为只有净土才能生出善种，也难理喻佛性人皆有之的梵音，平凡人的心性无不是至善田地。我不想那个渺茫而空无的净土，每个人具有实在的良知，而不是朦胧中的佛性，因为人的善良是不要披袈裟的，披袈裟那只是一种行为方式而已。



其实,我所钦慕的是释迦牟尼的六年苦行,因为那是他追求精神升华,履行亲身体验的自由之旅。我所以知佛、识佛是缘于释迦牟尼六年苦行,而自他以“四谛”“八正道”阐教,及至涅槃后便见生疏,对其后诸多衍生的部派“经、律、论”则视而不闻。因为,原本向往的自由韵味已经淡化,而人性的自由又不能用佛法来权衡。但佛教文学、艺术、逻辑等在人类文明史上是值得承认、探求的,那些琅琅上口的偈文及佛学化音乐形式也都是值得研习的,倘作为人生唯一的信仰则大可不必——至少我是不认同的。

倘若众生以般若性空的佛理修行,修行的终极是四大皆空,按记录下的经文修行的,都不得成佛。而僧众心里牵系着的那个佛境都是摹本,在行将入灭之际,具象全无,因为在之上永远有个无法达到的空界。

按照佛经的说法,佛有三世,过去世有一千佛,现在世有一千佛,未来世尚有一千佛,因而,续梦三世佛的僧众恒河沙数,追逐那个空境的人络绎不绝,只留下寂冷的石窟寺,依旧是惟妙惟肖的塑像和彩绘的壁画,并不断地被克隆。

我和虔敬佛者不同的,是把释迦牟尼当成非凡的人来看,他的精神世界升华后衍变成精神大厦让人瞻仰,但我不一定入住,也不一定神往,这与后来佛家的戒律毫无关系。

我更愿意筑以茅舍,几块裸石,几束白草,几根胡杨,围起一间茅舍,我相信存在真实,并仿佛筑起自己的壁垒。但我似乎受到了释迦牟尼的濡染,那条独行的路线正为我所实践,倘如说这也是一种修行。

佛心似我,那是我少年时对自由情调的追求,是一种囿于书斋中的解脱,倘若不为解脱,自由的行想也就被扼杀了。

我知佛是人群中的另类,并不是人类世界的一切。宇宙、地球、自然界,那是一个大境界,包括佛,无逾其外;因此,佛与我平等,借用佛经的说法,我或可称为外道佛。

不过,我是一个逃禅的行者,那形迹颇似辟支佛,据说这位佛尊因为生不逢时,独自能悟,不假它教,观十二因缘而得彻悟。也许,这座空荡的洞窟就曾走出过这般独觉的佛,这是一尊另辟蹊径的佛,大多数的佛教徒竟都把他忘却了。

坐想洞窟之中,忘乎所以,抬头再看,窟顶上的蜘蛛网已经织成,那真的是一张十分美丽的网……

◎佛行之路

昆仑山下，横贯一条东西向的路，五千年来，这条路走过不同的人，其中，就有往来东西方的僧侣。今天，当我行走在策勒县以北沙化的古道上，看不到一丝生机，唯有被漠风剥蚀得灰白色的胡杨残株疏落道旁。曾几何时，田园村舍被黄沙吞噬，只留下枯田荒埂、残垣断壁。此刻，我正走在湮没历史中的佛行之路上。

从中原和西域历史渊源的关系来看，早在殷商时期，于阗与中原已有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曾派遣副使前往于阗循河入昆仑山采玉，神爵二年（前 60 年）西汉王朝设立西域都护府，于阗与中原贸易、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因而，佛教经由于阗传入中原，自然会带有于阗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流所产生的某些相融的成分，尤其自两汉以后，汉语言、汉文字成为中原和于阗官方交流的语言文字，这对汉以后佛经的传播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见于传世资料有不少的说法，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



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像焉。”《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记载，汉明帝刘庄永平年间（58—75年），楚王刘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这两段文字表明汉明帝时宫廷、皇族供奉佛教。

但根据《后汉书·班梁列传》所记，班超（33—103年）至于阗时，当时的于阗国“其俗信巫”，表明天竺佛教东传之初，只是汉代王室皇族个人信仰取好，甚至连东传途经的于阗国也还没有立足。

汤用彤先生在《永平求法传说之考证》一章中说：“明帝求法，吾人现虽不能明当时事实之真相。但其传说，应有相当根据，非向壁虚造。至若佛教之流传，自不始于东汉初叶。”汤先生这段文字的论述十分明确，尤其是后面的一句，指出佛教的流传应当在东汉永平年以前。佛教最初传入于阗的时间可能是在公元前1世纪，但有关于阗最早流传佛教的史料记载至今难以考实。

中国封建社会积淀的儒家思想田园，并不是佛家播撒籽种的温床，佛家想把这片田园变作人间佛境只能是梦臆，毕竟，佛教理想中的净土离现实社会的土壤过于遥远，只能作为精神上的净土，在芸芸众生的耳畔飘来荡去，因为它的教义是让世人为来生作准备，而生者今世未了，焉求来世！这个虚幻的众生净土，对佛家而言是一个蕴含无穷量的极乐世界，而对一个将今生当来世享受的凡人来说，却是一个悲剧性的圆梦过程。这就不难理解，自东汉佛教经由西域传入中原，佛家经、律、论逐渐变得缜密，并迎合时事的需求，与玄学攀缘。佛家田园里秀木苍翠，其实，都是变种的菩提树。

佛教东传大兴之期约略在公元2世纪末，是伴随着大月氏人向东迁徙展开的。大月氏在早期史书中又称“禺氏”，战国时期游牧于敦煌、祁连山一带。公元前2世纪，匈奴兴起，迫使大月氏人西迁，大部分迁至中亚楚河流域，西迁的大月氏人占据了塞人的居住地，后来，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人南下征服了阿姆河流域的大夏国。公元1世纪，大月氏人征服了罽宾等邻国，建立了贵霜王朝，定都蓝氏城（今阿富汗境内）。

在贵霜王朝迦腻色伽统治时期，大月氏人已奉行小乘佛教，而这一时期，天竺东部兴起的大乘佛教向西逼近，一段内乱时期以后，小乘佛教僧众被逐出贵霜王朝地区，一大批小乘教派僧众向东方迁徙。

贵霜僧众是流落在丝绸之路南道的大月氏人，而这些大月氏人主要以小乘教派的僧众所构成。这些苦行僧身世如同断梗飘蓬，随漠风东来，后世称之为“行者”。殊不知佛教东渐之初离乡背井、命运未卜的厄运，绝不像后来人们想象的那么浪漫和神圣，也还未到达超脱凡俗进入彼岸的极乐世界，那是一群尘垢满面的跋涉者，他们在经历着通向罗汉体轮回的磨砺。

20世纪初，在洛阳地区曾发现佉卢文碑铭，上面镌刻着有关佛教僧团字样的内容，碑铭被推定为公元2世纪末至3世纪初所作，其时间与大月氏人东迁时间相吻合。从地理位置上分析，东迁的路线必然要经过于阗，所以，于阗流播佛教较之中原要早。19世纪末期，在和阗地区发现以佉卢文抄写在桦树皮上的《法句经》，语言为犍陀罗语。《法句经》为小乘部派经本，流行于犍陀罗地区。《法句经》传入于阗的时间大约在小乘教派、大乘教派并行时期，与大月氏僧众东迁时间相当或稍早。

在诸多的行僧中，来自犍陀罗的行僧多为月氏人，其姓氏汉文译作“支”姓。《高僧传》称：“优婆塞支谦，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来游汉境。”在支谦之前，曾有大月氏人支谶翻译经文，支亮为其门下弟子，支谦受业于支亮。据此，大月氏人东来传经的时间在公元2世纪中叶。

公元3世纪中期，大月氏人法护万里寻师，游历西域，得一百六十五部佛经，沿途传译至长安。这些大月氏僧人东行途中均经过于阗。佛教将边陲经、边行走称作“经行”。昆仑山下的于阗，就是来往东西的僧众必走的“经行之路”。

在这条佛行之路上，僧人的动机与目的并不完全相同。第一种因避难而由西向东传经，大月氏僧众属于此类；第二种因有感于经本舛讹，而去天竺求取真经，法显、玄奘属于此类；第三种视于阗为习经修行之地，其代表僧人为朱士行，将于阗当作修行净土，终老一生。僧行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经由西域陆路来去；二是水路兼程，或从海上乘船至天竺，取道西域返回，或经西域至天竺，取道海上返回。

自佛教东渐，于阗僧众接踵流寓中原。这些僧人通晓梵文，以译经、传经为业，或聚于都市解文授经，或散逸于灵山秀水口传心授佛理。仅见于《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所列和于阗国相关的行僧就不计其数。

《高僧传·译经中》记载，“先是沙门支法领，于于阗得华严前分三万六千



偈，未有宣释。”支法领应该是从犍陀罗到于阗的大月氏僧人，这部《华严经》后来在义熙十四年（418年），由觉贤译出，这或许是大乘《华严经》早期以偈文形式为主的经本。偈文是带有韵律的诗歌体，与后来散文式的经文风格不同，表明这部《华严经》文体尚带有小乘教以偈文传习的文风。

当时，沮渠蒙逊在河西走廊称王割据，崇信佛法，其从弟少年时涉流沙至于阗在瞿摩帝大寺，求学于天竺法师佛驮斯那。佛驮斯那习大乘，由于他“诵半亿偈，明了禅法”，在当时被称作“人中师子”。

又如，南朝宋景平元年（423年），建康龙光寺佛驮什翻译《五分律》，佛驮什“执梵文，于阗沙门智胜为译”。

昙无谶为中天竺人，据冯承钧先生《昙无谶与所译大般涅槃经前分》文中说，昙无谶“为385至433年间人”。初学小乘，后专大乘，东行到过龟兹（今新疆库车）、姑臧（今甘肃武威），后译出《初分》十卷，苦于经本不足，前往于阗求取经本《中分》带回姑臧翻译，之后，又遣派僧使前往于阗，寻得《后分》，于公元421年译就。

从时间上推算，于阗至迟在公元4世纪已经成为大乘佛经经本传输地，经文或为梵文书写，或为佉卢文书写。大乘佛教从西向东传播，为数众多的大乘经本几乎都是从于阗发散中原的。

自佛教传入于阗，东西方行僧汇聚于阗，视于阗为佛国净土。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僧人宋云、慧生于神龟元年（518年）出使西域取经，于阗境内有一座大寺，寺内有三百余僧人，寺中“有金像一躯，举高丈六，仪容超绝，相好炳然，面恒东立，不肯西顾”。

细读文中“面恒东立，不肯西顾”一句，揣测这尊金像或许是大月氏人所造，因避难东来，誓不返回犍陀罗，也或许汉僧所立，瞩望东方乡土。

据《佛国记》记载，中原僧人法显于晋隆安五年（401年）来于阗时，曾驻足于阗瞿摩帝大寺三个月，对于阗国佛教盛景记述甚详，大有身入佛境之感受，足见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西行取经僧人目的地已不旨在前往天竺，而将于阗之行当做目的地。其实，早在魏甘露五年（260年），僧人朱士行便西涉流沙来到于阗，取得大乘教经本。当时，于阗小乘教和大乘教并行，朱士行遣派弟子送至洛阳的《放光般若经》，是中原所见到的早期大乘教经本。朱士行笃